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陈锋 主编

2011 年卷

陈锋 主编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1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1年卷 / 陈锋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 - 7 - 5161 - 0861 - 1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经济史—研究—中国
②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 IV. ①F129②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428 号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1年卷 陈锋主编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 媛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64073836(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 - 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 址 <http://www.csspw.cn>(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	晏昌贵 (1)
元代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	
——以郭畀为中心的考察	申万里 (32)
清代的盐产区、盐场与场商、灶户、灶丁	陈 锋 曾衡之 (74)
清代河道总督的群体性结构考察	金诗灿 (91)
清代两湖地区茶业的生产工艺	杜七红 (103)
论《大清律例》与《皇越律例》的关系	阮氏秋水 (113)
张之洞与《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商约谈判	
——以“裁厘加税”为例	吴剑杰 (128)
寻找“横堤西街”	
——辛亥革命前后的汉口街巷	陈 玥 (141)
查慎行年谱	张 晨 (152)
武昌起义爆发后《通商汇纂》出版的号外之三	李少军 (194)
冯天瑜明清文化转型学术思想研究	谢贵安 (229)
二十世纪以来明清长江流域水利史研究综述	廖艳彬 (252)
近七十年晚清两湖漕政研究综述	洪 均 (277)
近二十年清代海盗研究综述	许淑贞 (286)
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契约研究	陈子敬 (301)
唐宋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评介	姚伟钧 (308)

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

晏昌贵

“日书”书题首见于云梦睡虎地 M11 秦简，此后在云梦睡虎地 M77 汉简、湖北随州孔家坡 M8 汉简，北京大学收藏汉简中均有发现，学界因而将与之相同或相似的简帛文献称之为《日书》。它是一种以时、日推断吉凶祸福的占验书，类似现今仍在港台地区流行的“通书”、“通胜”或“老皇历”。操此术者称为“日者”，《史记》有《日书列传》，《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①惜其文已亡佚，今所见者为后人所补。自 1975 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 11 号秦墓发现秦简《日书》以来，迄今发现和公布的战国秦汉简帛《日书》及相关材料已有二十多批（种），数量巨大，是战国秦汉简牍帛书材料中的大宗。从《日书》的书写材料看，主要有竹简、木简、木牍和帛书，而以竹简为主。从《日书》的出土形态看，有墓葬和遗址两种，墓葬所出，主要集中在楚国故地；遗址所出，则以西北边陲为多。这主要与当地的地质、土壤和气候条件比较适宜于保存简帛相关，不一定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日书》在当时的流通、传播状况。《日书》虽然称“书”，但从大量的简帛《日书》材料来看，与通常所见“书”（books）的物理形态还不完全一样，它是当时民众所使用的实用手册，诸多文本呈现出一种流动的、不固定状态。简帛《日书》的时代，从战国中晚期一直延续到东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318 页。

汉，与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时代大体一致^①。《日书》记载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具有古代“类书”的性质。这些《日书》材料的相继公布，刺激了相关研究的蓬勃发展。内容涉及方技数术、天文历法、社会经济、信仰习俗、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日书》的发现及其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记·日者列传》亡佚之不足，也使生活在21世纪的今人得以目睹古《日书》之面貌，极大地促进了战国秦汉史的相关研究。在本文中，我们将大体上按照《日书》抄写的时代（或墓葬下葬年代）的先后和保存状况的完整性为序，列举介绍已刊布或见诸报导的简帛《日书》材料，评述相关研究成果。

一 楚简《日书》

（一）九店楚简《日书》

目前发现比较完整的楚简《日书》见于江陵九店56号墓（M56）。九店墓地西南距纪南城1.2—1.5公里，南距江陵县城（荆州城）约8.5公里。该墓地自1978年发现，1981年正式发掘，至1989年结束，共发掘东周墓597座，是历年来在同一墓地发掘墓葬最多的一处^②。有关《日书》的报道最早见于1984年出版的《楚文化考古大事记》一书中，称“最值得注意的有：内容类似秦简《日书》的楚简”^③。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于199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全部《日书》的图版和释文，释文出自李家浩之手^④。据该报告，M56共出竹简205枚，约2700字（包括残损不清的字）。简文的书写从头端开始，不留天头。一简中字数最多的57字。整简长46.6—48.2厘米、宽0.6—0.8厘米、厚0.1—0.12厘米。其中1号简至12号简“应与农作物有关”，“13号简至24号简，分上、下两栏书写，记的是楚建除家言，与云梦秦简《日书》甲种1号简至13号简和乙种1号简至25号所记建除名称基本

^① 这是仅就已发现和公布的简帛《日书》材料而言的。《日书》起源于何时？这在目前学术界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或以为可早到殷商时期，或以为不能早于春秋时代。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楚文化研究会编：《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31页。

^④ 《江陵九店东周墓》，竹简释文见第506—511页，图版见一〇二至一二二。

相同。”“25号简至36号简，记的也是建除家言，与云梦秦简《日书》甲种1号简至13号简内容基本相同。”^①九店M56的年代为战国晚期早段^②。

九店楚简《日书》刊布后，武家璧据“荆尸朔于营室”一条简文，认为这是楚历建亥的证据^③。陈伟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对同一条简文却有不同的解释，坚持认为楚历以荆夷之月为岁首^④。刘彬徽在讨论楚国历法时，也利用了九店《日书》材料，却认为楚历建丑^⑤。

1996年，刘乐贤撰文指出，九店楚简《日书》是“首次发现的楚国日书，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将为今后的日书研究开创新的景象”。并将九店楚简《日书》的研究意义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它填补了数术尤其是择日术史料的空白。其次，它为进一步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提供了新的线索。最后，它对研究楚国社会风俗和历法也有参考价值^⑥。随后，他对九店楚简《日书》的文字释读、篇章结构和学术意义进行充分讨论，并纠正了以往对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中的一些缺失^⑦。近年来，刘乐贤还将九店《日书》作为楚日书的代表，比较楚、秦《日书》的异同，取得重要成果^⑧。

1997年，刘信芳撰文比较分析楚秦《日书》的异同，他把13—24号简称为“建赣”，25—36号简称为“结阳”，认为楚简“建赣”与“结阳”是两套择日体系。其中，“建赣”系用楚月名，是楚人的择日体系；“结阳”系或属其他诸侯国，甚或是由前代继承来的。他还认为

^① 《江陵九店东周墓》，第339页。

^② 同上书，第435页。

^③ 武家璧：《楚用亥正历法的新证据》，《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1日第3版。

^④ 陈伟：《新发表楚简资料所见的纪时制度》，《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第599—612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1997年10月。

^⑤ 刘彬徽：《楚国历法的建正问题辨证》，陈昭容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1辑，第335—362页，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七，2007年9月。

^⑥ 刘乐贤：《九店楚简日书研究》，《华学》第2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0页。

^⑦ 刘乐贤：《九店楚简日书补释》，《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5页。

^⑧ 刘乐贤：《楚秦选择术的异同及影响——以出土文献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秦简《日书》实质上是先秦《日书》的大杂钞，具有集大成的类书性质^①。陈伟亦将这两篇《日书》命名为“建赣”、“结阳”，对竹简的编连重新调整，并据墓中所出竹简“祷武夷”之辞以及随葬弓、剑等兵器，推测墓主“应系武士，很可能是一位‘兵死者’”^②。李零不同意上述刘、陈二位学者对“建赣”、“结阳”的命名，他在199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对比睡虎地《日书》，我们认为，九店《日书》的两套日名，‘建’字类是楚国建除，‘秀’字类是楚国的从辰。”^③在1999年发表的《读九店楚简》一文中又有进一步的申论^④。这种看法影响很大。

九店楚简《日书》中有一篇“告武夷”的祷文，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饶宗颐联系甲骨文、南朝地券及后世相关文献，考论武夷君和复山的关系，认为武夷与西南夷有关，简文为司兵死者，后转为地主神。复山则在巴东鱼复县^⑤。李零认为简文是兵死者的亲属向武夷君祝告，求他照顾兵死者的祷辞^⑥。芝加哥大学夏德安（Donald Happer）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并且认为像九店和睡虎地这样的简书很显然是具有很高文学素养的人编著的，这不是一种文学样式，而是一种主持宗教仪式的人或巫师们所用的文本。“告武夷”与《国殇》有关^⑦。李家浩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此篇的内容，是巫祝为因为兵死鬼作祟而生病的病人向管理兵死鬼之神武夷祝告，希望武夷能让病人之魂归来，饮食如故。“告

^① 刘信芳：《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比较研究》，《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第517—544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1997年10月。

^② 陈伟：《九店楚日书校读及其相关问题》，《人文论丛》1998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64页。

^③ 李零：《读几种出土发现的选择类古书》，《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6—104页；收入氏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21—338页。

^④ 李零：《读九店楚简》，《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收入氏著《中国方术续考》，第416—432页，删除与《日书》无关的第1—12号简的内容，改题为《读九店楚简〈日书〉》。

^⑤ 饶宗颐：《说九店楚之武夷（君）与复山》，《文物》1997年第6期。

^⑥ 李零：《古文字杂识（二则）》，《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第757—761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系，1997年10月。

^⑦ [美]夏德安著，陈松长译：《战国时代兵死者的祷辞》，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译丛》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2页。

武夷”与《招魂》、《大招》相近，招生人之魂^①。周凤五对该篇简文重新疏解，认为“告武夷”是一篇祝祷辞，祝祷的对象是掌管兵死者武夷，即后世所谓的“鬼王”。祝祷的对象虽是武夷，目的却在祭祀兵死者。“告武夷”是一篇通用的祝祷辞，篇中兵死者夫妇出于虚拟，并非实有其人。至于反映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生活，则是真实的^②。

2000年，经李家浩整理、注释的《九店楚简》一书出版，此前学者们在文字考释、竹简编连和篇章结构方面所取得的认识都在该书中有所反映，是一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③。该书所附《五六号、六二一号楚墓发掘报告》对56号墓有较详细的报道^④，并推测墓主人生前为庶人中地位较高者或“士”中的没落者，其职业或许与占卜有关^⑤。

《九店楚简》一书出版后，对九店《日书》的研究反而有所减少。李守奎集中讨论其中的“岁”篇，通过与睡虎地秦简《日书》比较，认为楚简《岁篇》与秦简《岁篇》运行到同一方位的三个月份是一致的，只是由于始点不同，次序有异^⑥。匈牙利学者贝山（Sandor P. Szabo）讨论了九店《日书》中的阴阳观念，认为简文中的“阴日”、“外阴日”和“外阳日”的行事规定是阴阳概念时空关系的表现^⑦。此外，学者对九店楚简《日书》中的“相宅”篇讨论较多，但大多集中在字词的考释上^⑧。

^① 李家浩：《九店楚简“告武夷”研究》，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1999年版，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344页。

^② 周凤五：《九店楚简〈告武夷〉重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4分，第941—959页，2001年12月。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④ 《九店楚简》，第149—154页。

^⑤ 同上书，第162—163页。

^⑥ 李守奎：《江陵九店楚墓〈岁〉篇残简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3期。

^⑦ [匈]贝山（Sandor P. Szabo）：《阴阳概念的时间关系与九店楚简》，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三）——“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556页。

^⑧ 娄昌贵、钟炜：《九店楚简〈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李守奎：《〈九店楚简〉相宅篇残简补释》，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351页；刘国胜：《九店〈日书〉“相宅”篇释文校补》，《简帛研究二〇〇二、二〇〇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112页；周波：《〈九店楚简〉释文注释校补》，《江汉考古》2006年第3期。

由陈伟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已结项，其中九店楚简部分由李家浩、白于蓝执笔，吸收了此前学者在文字考释、竹简编联、篇章分析方面的成绩，对简文详加注释，反映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①。

（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日书》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有《日书》残片，材料尚未公布。据李零介绍：“它是由一个讲二十八宿占的片断和一个讲裁衣宜忌的片断构成，篇幅很短，只是摘抄。”^②该批竹简并非科学发掘品，来历不明，学者一般认为年代在战国晚期，秦将白起拔郢（前278）之前^③。

二 秦简牍《日书》

（一）睡虎地秦简《日书》

睡虎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西部的一处平缓坡地上，东距云梦火车站仅百余米。1975年年底至1976年年初共发掘12座秦墓，《日书》出在第11号墓（M11）中^④。墓主人为一40—45岁的男性^⑤。M11最重要的发现要数1150多枚竹简，内容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甲、乙种^⑥，其中甲种《日书》共166枚简，置于墓主的头部右侧，简长25厘米、宽0.5厘米，双面书写；乙种现存共257枚简，发现于墓主的足部，简长23厘米、宽0.6厘米，“日书”即

① 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333页。

②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05页。

③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⑤ 同上书，第3—8页。

⑥ 同上书，第12页。

题写在乙种最后一枚简的背面^①。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中出土器物和《编年记》的有关记载，推断 M11 的墓主人即简文所记的“喜”，他生前曾担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为秦代社会下层官吏，死于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这应是 M11 的下葬之年^②。

睡虎地秦简大量的法律文献，适应当时“儒法斗争”的形势需要，其释文很快就在《文物》杂志上连载，文物出版社随即在 1977 年出版了八开线装大字本，有图版和释文，1978 年又出版了三十二开平装小字本，无图版，有释文、注释和语译，但这两个版本均未收录《日书》。直到 1981 年出版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报告，印有全部竹简的图版，才将《日书》收录，但也仅有不加标点、不分篇的释文。1990 年，《睡虎地秦墓竹简》八开精装本出版，所有图版、释文、注释、语译（《日书》未语译）齐备，乃是定本^③。

截至目前为止，睡虎地秦简《日书》仍是形式最齐备、内容最丰富的《日书》文本，研究成果也最多，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作为《日书》的一个典型标本。学者对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研究成果陆续有所综述、总结^④。相关研究不能备述，在此仅撮要举其大者。

早在 1980 年，曾宪通在讨论望山楚墓年代时就曾涉及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秦楚月名对照表”，是较早利用《日书》探讨楚月名与楚国历法的文章^⑤。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整理、注释者于豪亮在

^① 《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21—22 页。

^② 同上书，第 68—70 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第 1 版，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重印后记”。

^④ 参看林剑鸣：《曲径通幽处，高楼望路时——评介当前简牍日书研究状况》，《文博》1988 年第 3 期；张强：《近年来秦简〈日书〉研究评介》，原刊《文博》1995 年第 3 期，收入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附录三，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350—365 页；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二十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 年第 10 期；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9—34 页；沈颂金：《中日两国学者研究秦简〈日书〉述评》，收入氏著《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70—680 页；刘国忠：《中国古代数术研究综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⑤ 曾宪通：《楚月名初探——兼谈昭固墓竹简的年代问题》，原刊《中山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收入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43—360 页。

1981年撰文讨论其中的历法纪时制度，指出《日书》是关于选择日子吉凶的迷信书籍^①。这是最早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两篇论作，讨论的问题均与历法纪时有关，属于科技史范畴，盖因科技史研究比较“客观”而较少禁忌，其研究得以早进行。通过讨论，大致可以确立楚月名与秦月名的对应关系，但在利用《日书》探讨楚国历法方面，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此后，利用《日书》进行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颇为兴盛，内容涉及楚秦历法、纪时制度、玄戈等星象，在古代时制、二十八宿纪日法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②。

1982年，由饶宗颐、曾宪通合著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在香港出版，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后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饶在书中指出：“日书者，当是日者所用以占候时日宜忌之书。”^③并引《墨子》及《日者列传》，论及《日书》的性质，指出甲种“秦除”之除、乙种“徐”及“秦”，均指建除；稷辰为从辰；对往亡、归忌，禹步、禹符的讨论，大都要而不繁，今天看来，大多是正确的。他把“濡羸建陷”与“窾结”、“结阳”联系起来考虑，认为是“另有一套建除家言，日名复异。”^④与通行看法将后者看作是楚“从辰”者不同，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在书的“跋尾”云：日书研究意义有二，其一，对于天文

^① 于豪亮：《秦简〈日书〉记时月诸问题》，原刊《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1—357页；此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162页。李学勤《纪念于豪亮同志》（《于豪亮学术文存》第4页）说：“秦简里的两种《日书》，非常复杂，性质又是数术书，而秦汉数术久已失传，前人很少研究。于豪亮同志苦心孤诣，爬梳有关典籍，写成了《日书》的注释稿，同时还撰有论文，成为《日书》的第一位研究者。”

^② 杨巨中：《〈日书·星〉释议》，《文博》1988年第4期；[日]成家彻郎：《中国古代的占星术和古星盘》（裴岗译），《文博》1989年第6期；[日]成家彻郎：《睡虎地秦简〈日书·玄戈〉》（王维坤译），《文博》1991年第3期；王志平：《睡虎地〈日书·玄戈篇〉探源》，《文博》1999年第5期；尚民杰：《从〈日书〉看十六时制》，《文博》1996年第4期；尚民杰：《云梦〈日书〉十二时名称考辨》，《华夏考古》1997年第3期；尚民杰：《云梦〈日书〉星宿记日探讨》，《文博》1998年第2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二十八宿纪日法补证》，收入氏著《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70—84页。关于《日书》与历法研究的综合讨论可参看陶磊：《〈日书〉与古历法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9期。

^③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收入饶宗颐、曾宪通《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5页。

^④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11页。

学研究的意义；其二，可以追溯古巫术与道教的关系^①。但书中也有分篇不严，议论未审处，如以“人日”比附以色列上帝七日造人之说、对“岁”篇的研究等^②。但瑕不掩瑜，首创之功不可没，尤其是开创了《日书》数术研究的先河，影响深远。

1985年，李学勤发表《〈日书〉与楚、秦社会》一文^③，文中指出：对于《日书》至少可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方面，是从数术史的角度考察，另一方面，对《日书》的内容还可以作社会史的考察。《日书》虽系趋吉避凶的迷信，但所罗列的事项条文，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的不少情况。并具体研究了楚、秦在奴隶制关系上的差异。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日书》的，还有林剑鸣主持的西北大学“《日书》研讨班”，他们于1986年发表的《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作为代表，正如文章题目所昭示的，他们从《日书》中“看到了秦国社会普遍存在着的宗教、鬼神观念，看到了支配着这些观念、意识的风俗习惯、阶级关系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日书》是公元前3世纪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④。林剑鸣还身体力行，先后发表《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等重头文章，从宏观上把握《日书》所反映的秦文化特点，并探讨《日书》与法律文书同出一墓的原因，说明秦代官吏拥有数术类文献实在于了解地方风俗、习惯和民间信仰，提醒人们对秦汉时代法在吏治中的作用不应估计过高^⑤。此后，“《日书》研讨班”成员分头把关，张铭洽从数术占卜

^①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40页。

^② 《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30—431、481—501页。关于“人日”的后续研究，可参看胡文辉《“人日”考辨》[原刊《中国文化》第9卷（1994年2月），后收入氏著《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348页]、李文渊：《先秦、六朝“人日”风俗的演变及其意义——睡虎地〈日书〉与〈荆楚岁时记〉所见“人日”的比较研究》，《长江文化论集》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7页。关于“岁”的后续研究，可看胡文辉《释“岁”——以睡虎地〈日书〉为中心》，原刊《文化与传播》第4辑，海天出版社1994年版，收入《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88—134页。

^③ 李学勤：《〈日书〉与楚、秦社会》，原刊《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收入氏著《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44页。

^④ 《日书》研读班：《日书：秦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文博》1986年第5期。

^⑤ 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的角度^①，吴小强从人口史的角度^②，贺润坤从经济史的角度^③，李晓东、黄晓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从事《日书》研究^④，发表了一系列论作，成为《日书》早期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利用《日书》进行社会史研究方面，必须注意到《日书》史料的特殊性质，这方面李零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说：日书“所占的内容涉及古代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对民俗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指标。因为日书都是世代相传、反复使用的手册，内容完全是设计好的和程式化的，几千年来很少变化。它们并不是实际的占卜记录，更不是社会生活的写实。”^⑤

1988年，英国学者何四维发表《睡虎地日书初探》（The Almanacs (jih - shu) from Shui - hu - ti: A preliminary Survey）一文，对睡简《日书》作了全面介绍，并建议可对下列问题作深入研究：一、纪日与计算日期的方法；二、《日书》五行与《月令》五行之比较；三、《日书》所见天文学；四、《日书》所见神话；五、《日书》所见饿鬼

^① 张铭治：《云梦秦简〈日书〉占卜术初探》，《文博》1988年第3期；《〈史记·日者列传〉小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96页；《秦简〈日书〉之“建除法”试析》，《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99页。又见王子今、白建钢、彭卫主编《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234页；《秦代“巫现象”杂谈——兼谈秦代的“日者”》，《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235页。

^② 吴小强：《秦人婚姻家庭生育观念新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秦人生育意愿初探》，《江汉论坛》1989年第11期；《〈日书〉与秦社会风俗》，《文博》1990年第2期；《从云梦秦简看战国秦代人口再生产类型》，《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③ 贺润坤：《从〈日书〉看秦国的谷物种植》，《文博》1988年第3期；《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国的六畜饲养》，《文博》1989年第6期；《云梦秦简日书寓人、寄者、寄人身份考》，《文博》1991年第3期；《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国的农业水利等有关状况》，《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从云梦秦简〈日书〉看秦民间的灾变与救灾》，《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云梦秦简〈日书〉“行”及有关秦人社会活动考》，《江汉考古》1996年第1期；《从云梦秦简看秦社会有关捕盗概况》，《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51页。

^④ 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秦人鬼神观与殷周鬼神观比较》，《人文杂志》1989年第5期。

^⑤ 李零：《中国方术考》，第216页。

信仰。^①

1993年，蒲慕州发表《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一文^②，认为所谓《日书》并不是完整的“书”，而是一些个别篇章的集结。睡虎地秦简《日书》应代表流行于战国末年时各地中下阶层的某些文化习俗，《日书》所反映出的不但不能说是“秦文化”，甚至不能说是秦人中下阶层的文化，而应该是当时中国社会里中下阶层共同文化的一部分。《日书》反映出了秦末中国社会里以中下阶层为主的人民生活和信仰的部分情况。这些意见应该都是可取的。蒲氏在后来出版的《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一书中，将《日书》看作是一部当时人信仰生活的手册，据此复原战国晚期一般民众的信仰生活世界^③，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1994年，刘乐贤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有感于此前《日书》研究中存在的“粗疏”之失，刘氏提出：“本书准备在对《日书》进行全面训释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数术有关的资料揭示出《日书》的数术内涵，试图由此复原战国秦汉时代择日术的原貌。并以此为据，对《日书》所反映的楚、秦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论述。”^④通观全书，刘氏完全达到了他预先设计的目标：利用文献学方法全面训释相关字词含义、进行分篇整理，利用相关数术文献揭示《日书》的数术内涵，从而复原古代择日术的原貌，在此基础上讨论古代的疾病观念、祭祀活动、神话传说、阴阳五行等重要社会现象。这是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2000年，吴小强出版《秦简日书集释》一书^⑤，收录全部睡虎地秦简和部分放马滩秦简。全书由“释文”、“注释”、“译文”、“述论”

^① 原载Asia Major3.1. pt. 2 (1988): 1—27。对该文的介绍见吕宗力《何四维、鲁惟一与简帛学》，《简帛研究汇刊》第二辑《第二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77—196页，中国文化大学文学院、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4年。

^② 蒲慕州：《睡虎地秦简〈日书〉的世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4分，第623—675页，1993年4月。

^③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98—120页。

^④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⑤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2000年版。

四部分组成，注释照录秦简整理小组的成说，汇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择善而从。译文以直译为主，达意顺畅。述论则对《日书》一章或若干章内容进行概述、评述。这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普及读本。

2001年，刘增贵发表《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一文^①，该文连同后来发表的有关“土忌”篇神煞考释文章^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日书》神煞运行“原理”的分析探讨，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些数术原理，实际上就是五行学说的运用，这方面由饶宗颐开其端，学者们多有探索^③。但由于五行学说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一神煞的运行干支，往往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较难得出一致的结论。

2003年，王子今出版《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一书^④，该书在全面占有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疏理甲种《日书》的相关简文，引证丰富，尤其是利用文化人类学观点和材料研究睡虎地秦简《日书》，形成其研究特色。

总之，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近30年来，在文献学、科技史、社会文化史、民间信仰习俗、数术史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为其他《日书》材料的鉴别和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参照。

（二）放马滩秦简《日书》

放马滩又名牧马滩，属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西距麦积山石窟20公里。1986年3月被发现，6月正式发掘，9月结束。出土《日

^① 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第503—541页，2001年9月。

^② 刘增贵：《睡虎地秦简〈日书〉〈土忌〉篇数术考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4分，第671—704页，2007年12月。

^③ 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原刊《古文字研究》第14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1—280页；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第455—472页；刘乐贤：《五行三合局与纳音说——读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刘信芳：《〈日书〉四方四维与五行浅说》，《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2期；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文博》1997年第2期；王光华、李秀茹：《试析秦简〈日书〉辰、戌、丑、未四季土》，《求索》2006年第9期；刘道超：《秦简〈日书〉五行观念研究》，《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④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书》的1号墓（M1）为一棺一椁墓，随葬器物33件，大部分置于棺与椁之间。考古工作者据墓中出土器物和《墓主记》（按：即《志怪故事》）等材料，推断该墓为战国晚期秦人墓，墓主人生前为邽县的一个基层官吏，下葬的年代当在秦始皇八年冬或九年初^①。但也有学者认为墓的年代应在秦昭王三十八年至秦代之间^②。

放马滩《日书》大多保存完整，简上原有上中下三道编绳，上下端各空出1厘米为天地头。大部分简的天地头两面还粘有深蓝色布片，推测编册后曾用布包裹。每简右侧有三角形小楔口，上留有编绳朽痕。简文都以古隶体书写在篾黄面，最多每简45字，一般在25—40字之间。竹简出土时已散乱，无篇题。据其形制，《日书》可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日书》共73枚，出土时卷在简的最中间。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乙种《日书》共379枚，简长23厘米、宽0.6厘米。据介绍，其内容既有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相同者，也有一部分不见于睡虎地秦简《日书》^③。同墓所出尚有一种《墓主记》，共8枚简，据说明出土时与《日书》卷在一起，“与《日书》同为一卷”^④。这是值得注意的。

1989年整理小组公布了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释文^⑤，此后甲乙种《日书》的释文和照片陆续有所刊布^⑥，已公布的释文存在一些问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② 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70—172页。也有人认为此墓是汉墓非秦墓，见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引或说。

^③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④ 何双全：《简牍》，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关于《墓主记》，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原刊《文物》1990年第4期，收入《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167—175页）、夏德安《战国民间宗教中的复活问题》（原刊《道教源流》第5卷第2期，1994年12月，陈松长、熊建国译，《简帛研究译丛》第1辑，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43页）有很好的研究。

^⑤ 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研究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同书第7—28页还载有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一文。

^⑥ 马建华主编《河西简牍》（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收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16枚、乙种16枚照片及释文。